

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“惠校本”及其他*

张丽娟

内容摘要: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重要校本“惠校本”的异文来源包括宋刻八行本及余仁仲本异文,也包括少量其他版本来源或他校、理校之异文;而在《校勘记》中,“惠校本”与“余本”分立,夹杂“惠校宋本”、“宋本”之称,主要体现的是宋刻八行本的异文。由于《校勘记》仅据校本而未能亲见宋刻八行本,其对八行本的利用有一定局限。

关键词:惠校本 八行本 阮元 《校勘记》

阮元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网罗众本,利用了当时所能搜罗到的众多经籍旧本及精校本,汇校异同,成为经籍校勘的经典之作。这些版本有的比较明确,可与今存诸本相印证;有的则或著录不详,或来源复杂,与今存版本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。特别是一些辗转相传的校本,其异文来源大多不甚明晰。考察这些校本的异文来源,比较其与今存版本的对应关系,对于认识经书注疏版本源流、总结《校勘记》校勘成果、推进新的经典整理工作,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(以下简称《校勘记》)“引据各本目录”中,列“注疏本”五种:惠校本周礼注疏、附释音周礼注疏、闽本周礼注疏、监本周礼注疏、毛本周礼注疏。后四种版本比较明确:“附释音周礼注疏”即元刻明修十行本,为《校勘记》底本;闽、监、毛本分别为明嘉靖李元阳刻本、明万历北监刻本、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,为明清通行《十三经注疏》版本。惟关于“惠校本周礼注疏四十二卷”异文源自何本,引据目录表述得很含混,其下小字注云:“卢文弨曰:东吴惠士奇暨子栋以宋注疏本校疏,以余氏万卷堂本校经注音义,书于毛氏本。何焯云:康熙丙戌,见内府宋板元修注疏本,粗校一过。惠栋云:卢见曾尝得宋槧余仁仲周礼经注,校阅一过,书共十二卷。”^①此皆过录惠校本诸人题跋

*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《十三经注疏》版本研究”(14BTQ020)阶段性成果。

①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,第181册,第98页。

语,并未对惠校本异文来源做出明晰交代。从诸人跋语看,惠校本异文似当出自所谓“宋注疏本”及“余仁仲本”。又《校勘记》卷一首条“周礼正义序”下云:“卢文弨曰:东吴惠半农名士奇,暨子定宇名栋,以宋本校正疏,以余氏万卷堂本校经注音义。今均称‘惠校本’云。”^①据此则《校勘记》似以“余仁仲本”与“宋注疏本”异文统称为“惠校本”。

所谓“余仁仲本”,即南宋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本,今有数经存世,《周礼》在清代有流传,今日已不存。所谓“宋注疏本”,从清代传存注疏版本的实际情况看,清人认定的宋刻注疏本,包括有十行本与八行本,十行本即《校勘记》及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底本,《校勘记》中的“惠校本”异文当可排除十行本,则最大的可能是出自八行本。昌彼得先生在研究台北故宫所藏宋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时曾指出:“昔阮芸台校刊《十三经注疏》,于《周礼注疏》除用宋十行本及明闽、监、毛诸本外,謄正最多者为惠士奇、惠栋父子校本,而惠氏校本乃据何义门校本。何氏云:‘康熙丙戌(四十五年)见内府宋版元修注疏本,粗校一过。’何氏所见内府藏本,殆即此帙,故惠氏校语多与此本合。”^②昌先生指出《校勘记》惠校本异文出自宋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,这一方面源于其对诸本源流的深入认识,一方面也当是建立在对八行本《周礼疏》与《校勘记》惠校本异文比勘的基础上。惜昌文重点不在此,故并未在这方面多做探讨。而《校勘记》具体校记中,除用“惠校本”之称外,还另及“余本”、“互注本”、“宋本”、“惠士奇云”、“惠栋云”等,颇有参差。究竟《校勘记》惠校本版本来源如何,惠校本异文是否与八行本一致,“惠校本”与“余仁仲本”、“宋本”有何联系与区别,等等,还需要具体梳理《校勘记》引用惠校本的情况,比勘惠校本与今存版本异同,方可获得对《校勘记》惠校本及相关版本的清晰认识。

一、“惠校本”异文多与八行本合

宋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今存主要有三个传本,一藏中国国家图书馆,为清怡府及朱氏结一庐旧藏;一藏台北故宫博物院,为清宫旧藏,即昌彼得先生所跋之本;另一部残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,存二十七卷,曾经明袁忠彻、清宋筠及李盛铎递藏^③。《校勘记》“惠校本”录何焯跋云:“康熙丙戌,见内府宋板元修注疏本,粗校一过”。何焯有《跋李贺歌诗编明刻本》记“内府宋槧二十家唐人集,长吉《歌诗编》在焉,祇役武英偶得见之”;《跋茅鹿门评王荆公文钞》记“内阁宋刻临川集”,^④两跋皆作于康熙丙戌(四十五年),与其校“内府宋板元

①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,第181册,第99页。

②昌彼得:《跋宋浙东茶盐司本〈周礼注疏〉》,《增订蟬庵群书题识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97年,第11页。

③参见张丽娟:《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3年,第303页。

④何焯:《义门先生集》卷九。

修注疏本”在同一年。何焯于康熙四十一年以李光地荐入南书房,后为皇八子府侍读,兼武英殿纂修,有机会阅读内府藏珍贵图籍。何氏所见内府本,确如昌彼得先生所言,很可能即今故宫所藏之本。当然这只是推测,判断“惠校本”异文是否源自八行本,最可靠的证据还是比勘两本异文。

我们今选取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卷一部分内容(相当于阮元本《周礼注疏》卷一),将“惠校本”异文与宋刻八行本《周礼疏》(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,以下简称八行本)相比较,并参校日本京都大学藏旧抄单疏本《周礼疏》,以考察“惠校本”异文的版本来源。此部分《校勘记》采用“惠校本”共计十九处,列举如下:

1.“‘天事又并入于春官者’。惠校本无‘又’,此衍。”(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,第181册,第100页,以下仅标页数)

按:八行本无“又”字,与惠校同。单疏本同阮校底本有“又”字。

2.“‘故云第一也郑氏者’。惠校本‘云’作‘为’。”(第100页)

按:八行本作“为”,与惠校同。单疏本同阮校底本作“云”。

3.“‘或言传’。惠校本‘言’作‘云’。”(第100页)

按:八行本作“云”,与惠校同。单疏本同阮校底本作“言”。

4.“‘置槩以县视以景’。余本、嘉靖本、毛本‘槩’作‘桀’,《释文》同。惠校本疏中亦从‘桀’。此从‘执’,误。”(第100页)

按:八行本、单疏本疏文皆作‘桀’,同惠校本。八行本注文亦作‘桀’,《校勘记》未及。

5.“‘一日人无主不散则乱’。惠校本作‘百人无主’。此‘百’字误分为一、日二字。卢文弨曰:《书大禹谟》正义亦有百人无主不散则乱之语。”(第101页)

按:八行本、单疏本皆作“百人”,与惠校同。

6.“‘又当立臣为辅’。惠校本无‘为’。”(第101页)

按:八行本无“为”字,与惠校同。单疏本同阮校底本有“为”字。

7.“‘然不先均王国’。惠校本‘先’作‘言’,此误,当订正。”(第101页)

按:八行本、单疏本皆作“先”,不作“言”,与惠校不同。

8.“‘恐不兼诸侯’。惠校本‘恐’作‘悉’,此误。”(第101页)

按:八行本作“悉”,与惠校同。单疏本同阮校底本作“恐”。

9.“‘言百则三百六十亦一也’。惠校本无‘亦’,此衍,当删。”(第101页)

按:八行本无“亦”字,同惠校。单疏本同阮校底本有“亦”字。

10.“‘不释唯指此一经至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而已’。闽本同误也,监、毛本‘释’改‘得’,当据以订正。惠校本作‘不得惟’。”(第101页)

按:八行本、单疏本皆作“不得惟”,同惠校。

11.“‘腊人之类’。惠校本‘腊人’上有‘鳖人’,此脱。”(第101页)

按:八行本、单疏本皆无“螫人”二字,与惠校不同。

12.“‘故宫伯所掌者亦掌之’。闽本同,监、毛本‘掌者’误‘长者’。惠校本作‘掌者’。”(第101页)

按:八行本、单疏本皆作“掌者”,与惠校同。

13.“‘财不久停’。惠校本作‘则不用久停’。孙志祖云:下取币疏亦有财不久停之语,文理本明,似不必改。”(第101页)

按:八行本作“则不用久停”,与惠校同。单疏本同阮校底本作“财不久停”。

14.“‘故此宫正之弟’。惠校本‘弟’作‘等’,此误。”(第102页)

按:八行本、单疏本皆作“等”,与惠校同。

15.“‘按左氏晋惠公之女名妾称为宦女’。《汉制考》‘按’作‘案’,此非。下疏多用‘案’字。惠校本无‘为’,此衍。”(第102页)

按:八行本无“为”字,与惠校同。单疏本同阮校底本有“为”字。

16.“‘已上皆言饮食此次言货贿’。惠校本‘次’作‘讫’,此误。”(第103页)

按:八行本、单疏本“此”作“讫”,“次”字同阮校底本。此盖误认被校字“此”为“次”。

17.“‘汉时司农主治藏’。惠校本‘治’作‘府’。案《汉制考》亦引作‘府藏’,此因注误改。”(第103页)

按:八行本、单疏本皆作“府”,与惠校同。

18.“‘御进也’。惠校本作‘犹进后法也’。案此释御为进,释妻为后也,当据以订正。此本实阙,以字数计之,亦止有三字。”(第103页)

按:“御进也”,八行本作“犹进后法”,单疏本作“犹进也法”。惠校“犹进后法也”与八行本稍异。

19.“‘连类在此’。惠校本下有‘也’。”(第104页)

按:八行本、单疏本“此”下皆有“也”字,与惠校同。

以上《校勘记》引用“惠校本”十九处,“惠校本”异文与八行本完全相同者共15处。另第16条《校勘记》言惠校本“次”作“讫”,而单疏本、八行本皆“此”作“讫”,此被校字误出,当为校勘或过录中的偶误,“讫”字异文与八行本是相符的。第18条《校勘记》言惠校本作“犹进后法也”,较八行本“犹进后法”多出一“也”字,当亦出自八行本。可见昌彼得先生所说的“惠氏校语多与此本合”,并非虚言。特别是其中第1-3,6,8-9,13,15共八条,“惠校本”异文与八行本同,而与《校勘记》底本及单疏本皆不同,更加证明“惠校本”与八行本的密切关系。当然这十九条引用“惠校本”异文中,还有第7条与第11条,“惠校本”异文与八行本异文不符。这两条“惠校本”异文究竟是误校或传抄之讹,或是另有版本依据,我们下文再探讨。

八行本《周礼疏》的卷次与通行本不同,其注疏合刻体例亦与十行本以下

诸本有很大差异。《校勘记》引用“惠校本”时,对其分卷情况及体例特点有所揭示,亦与八行本《周礼疏》相合。如《校勘记》卷三:“‘族师’。宋本周礼疏卷第十三。”(第148页)卷四:“‘周礼卷第四’。宋本周礼疏卷第十四,十行本仍卷第十三。”(第152页)按八行本《周礼疏》共五十卷,卷次沿袭单疏本;十行本以下注疏本改易单疏本卷次,编为四十二卷,故分卷与单疏本、八行本不同。“族师”在十行本、闽、监、毛本、阮元本等通行注疏本中皆在卷第十二,仅在单疏本及八行本中属卷第十三。《周礼》经注本卷第四“地官司徒下”起始部分,在通行注疏本中皆在卷第十三,而在单疏本、八行本中属卷第十四。《校勘记》所记“宋本周礼疏”卷次与八行本相合。又《校勘记》卷五:“‘女巫无数’。余本、闽、监、毛本同,皆连上文。嘉靖本及惠校本别跳行。下大史、小史同。”(第170页)十行本以下诸本“女巫无数”皆连上文“男巫无数”,不另起行;而八行本中“女巫无数”转行另起(见八行本《周礼疏》卷第十八第十七叶),与惠校同。《校勘记》卷五:“‘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礼’。惠校本于此分节,‘小祭’至‘之礼’一节疏在此经下。”(第175页)十行以下诸本“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礼”与下文“大宾客受其将币之赍”连为一节,下接注、疏。而八行本中,“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礼”与“大宾客受其将币之赍”经文分列两节,“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礼”下紧接此节疏文(见八行本《周礼疏》卷第二十第十七叶),与惠校同。“惠校本”独特的卷次、体例皆与八行本合,可证“惠校本”与八行本的渊源。

二、“惠校本”与“余仁仲本”

“余仁仲本”简称“余本”,是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经注文部分的重要校本。《校勘记》引据各本书目“经注本”中有“钱孙保所藏宋本周礼注十二卷”,小字注云:“宋槧小字本,附载音义。春官、夏官、冬官,余仁仲本。天地二官,别一宋本。秋官,以俗本抄补,非佳者,臧庸据宋刻大字本秋官校补。”^①钱孙保本春官、夏官、冬官为宋余仁仲本,天官、地官、秋官配补其他版本。而据《校勘记》“惠校本”下小字注及《校勘记》卷一首条校记,惠校本亦包含余仁仲本异文,且惠校本详记余仁仲本各卷末刻书识语,说明其所据余仁仲本《周礼》十二卷完整无缺。据此,《校勘记》春官、夏官、冬官部分的“余仁仲本”异文,有惠校本及钱孙保本两个来源;天官、地官、秋官部分的“余仁仲本”异文,当主要源自惠校本。

余仁仲本为经注附音义本,故余仁仲本异文仅限于经注文及释文校记中,不涉疏文。今检《校勘记》经注文校记,无论是天、地、秋官,亦或春、夏、冬官,皆径列“余本”、“余仁仲本”异文。如卷一“‘太保朝至于雒’。余本太作大,下同。”(第100页)“‘则六官共举之’。余本、岳本、嘉靖本同。闽、监、毛本

^①《周礼注疏校勘记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81册,第98页。

‘官’误‘宫’。”（第104页）卷五“‘女奴有才知者’。余本、嘉靖本同，闽、监、毛本‘知’改‘智’，非。”（第169页）“‘谓敛者’。余本同。嘉靖本、闽、监、毛本作‘亲敛者’。”（第176页）卷五内容属“春官”，钱孙保本“春官”为余仁仲本，《校勘记》有原本可据；卷一内容为“天官”，钱孙保本“天官”非余仁仲本，《校勘记》所据仅有惠校本中的余仁仲本异文。而在《校勘记》各卷校记中，不论来源，皆统称“余本”。

《校勘记》经注文校记中多列“余本”，而提及“惠校本”者极少。以下是卷三经注文校记中可数的几处：“‘育生也’。嘉靖本‘育’作‘毓’，非。惠校本亦作‘毓’，云余本仍作‘育’。”（第142页）“‘诸男食者四之一’。惠校本‘诸男’上增‘诸子’二字，云余本无。案贾疏本亦无‘诸子’二字，故云‘直举男地而言’。惠以意增，非。”（第142页）。“‘谓园圃毓草木’。闽、监、毛本同。宋本作‘谓园圃育草木’。嘉靖本‘毓’作‘育’。惠校本亦作‘圃育’，云互注本、余本作‘圃毓’。”（第144页）“‘恤振忧贫者’。宋本‘振’下有‘于’，盖因上误衍。惠校本亦有‘于’字，云互注本、余本无。”（第144页）“‘乱民乱名改作’。诸本同。惠校本‘名’一作‘民’，云互注本、余本作‘名’。”（第144页）“‘地事谓农牧衡虞也’。诸本同。惠校本作‘虞衡’，云余本仍作‘衡虞’。”（第145页）“‘敬所举贤者能者’。嘉靖本‘敬’作‘宾’，非。惠校本亦一作‘宾’，云余本仍作‘敬’。”（第147页）

《校勘记》卷三内容相当于阮元本《周礼注疏》卷九至十三，属“地官”，钱孙保本“地官”部分非余仁仲本。《校勘记》这部分校记中大量引用的“余本”出自惠校，而皆径称“余本”，不称“惠校本”。上述仅有的几例引用“惠校本”，乃因“惠校本”与“余本”有异，遂特别提出“惠校本作某，云余本作某”。

《校勘记》卷五经注文校记情况与卷三相似，余仁仲本径称“余本”，偶见“惠校本”，如：“‘吉凶宾军嘉’。诸本同。惠校本作‘军宾’，云：余本仍作‘宾军’。按惠栋当据宋本疏作‘军宾’。”（第168页）“‘谓楯也’。余本、闽、监、毛本同。《释文》出‘谓楯’二字。嘉靖本‘楯’作‘盾’，惠校本同。”（第170页）“‘谓磔攘及蜡祭’。余本、闽、监、毛本同。《释文》、嘉靖本、惠校本‘攘’作‘攘’。余本载音义作‘攘’。”（第171页）“‘右彫几’。唐石经诸本同。惠校本‘彫’作‘雕’，云余本仍作‘彫’。下注同。”（第179页）“‘灌先王祭也’。岳本、嘉靖本同。余本、闽、监、毛‘灌’改‘裸’。惠校本作‘灌先玉祭也’。”（第181页）“‘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’。余本、岳本、嘉靖本、惠校本同。监、毛本‘顛’作‘颠’。”（第181页）。

《校勘记》卷五内容相当于阮元本《周礼注疏》卷十七至二十二，属“春官”。这部分校记中的余仁仲本异文有钱孙保本及惠校本两个来源。《校勘记》大部分校记仍仅列“余本”，不称“惠校本”，也不称“钱孙保本”。偶尔提及“惠校本”的校记中，“惠校本”大多与“余本”文字有异。

卷五“春官”经注文校记列举“惠校本”时，表述方式有“余本作某，惠校

本作某”者,与卷三“地官”校记之“惠校本作某,云余本作某”有微妙的差异。特别是卷五“柱左右颧及在口中者”一条,“余本”与“惠校本”文字并无差异,而并列举出。这透露出《校勘记》春官与地官“余仁仲本”异文的不同来源:卷三“地官”《校勘记》所据仅有惠校余仁仲本,故“惠校本”与“余本”并提时皆称“惠校本作某,云余本作某”。而卷五“春官”《校勘记》另有钱孙保藏余仁仲本可据,故有“余本作某,惠校本作某”的表述。

总体来看,《校勘记》各卷经注文校记中大量采录“余本”异文,而“惠校本”鲜少提及。只有在“惠校本”与“余本”有异的情况下,方提出“惠校本作某”。虽然《校勘记》采用了惠校本中的余仁仲本异文,特别是天、地、秋官部分余仁仲本异文仅有惠校本一个来源;虽然《校勘记》卷一首条出校说余仁仲本与宋注疏本“今均称‘惠校本’”,但在具体校记写作过程中,《校勘记》还是将“惠校本”与“余本”有意作了区别。这种区别是为了明确标示余仁仲本异文,避免其与惠校其他版本相混淆,这当然是一种合理的做法。但《校勘记》因此舍弃了惠校八行本经注方面的大量异文,颇令人遗憾。如上举卷五“‘女奴有才知者’。余本、嘉靖本同,闽、监、毛本‘知’改‘智’,非”一条,八行本与余本同,亦作“知”,《校勘记》不列。“‘谓斂者’。余本同。嘉靖本、闽、监、毛本作‘亲斂者’”一条,八行本作“亲斂者”,与余本不同,《校勘记》亦未列。《校勘记》利用惠校八行本纠正了通行本疏文中的许多讹误,但八行本经注方面的文字胜处,并未能被《校勘记》充分反映,是其一大缺憾。

三、“惠校本”异文的其他来源

《校勘记》“惠校本”异文绝大多数与八行本《周礼疏》相合,但也有少量“惠校本”异文与八行本文字不符。我们知道《校勘记》作者并未见到八行本原本,依据的只是辗转传录的“惠校本”,校勘过程中可能有偶然疏误,辗转传录过程中也可能出现讹误。上文第16条“惠校本”出校字有误,第18条“惠校本”多出一“也”字,很可能就是辗转传抄或校勘中偶误所致。而像第7条、第11条“惠校本”与八行本不符,却不似偶误,是否“惠校本”异文还有其他来源呢?

惠校《周礼注疏》原本已不存,今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毛氏汲古阁本《周礼注疏》,有清吴昶过录何焯、惠士奇、惠栋校。并有吴昶跋云:

是书原本系元和惠氏点勘,红笔半农先生所阅,墨笔则松崖征君所加也。大约先录何义门先生所校内府宋板元修本,继录余氏万卷堂本,然经转写,其中错讹往往而有。如经注每段中连见之字,一注万本,一脱不注。不注者,本系内府宋本。今脱万卷堂字,则混于宋本矣。疏中时杂出“宋作某”三字。万卷本无疏,校疏者,内府宋本也。今杂出“宋作某”字样,则其余不注者,反似又有别本。又有徐家本,校经注。订义本,校经疏。互注本,校经注、音义。并偶有称建本者,校疏。卷首止载以宋本、万卷本校,其余诸本不知何时所槧也。其黄笔数条云“文弼案”云云者,今学士卢公所记。

又王大隆跋云：

此娄县吴芸阁临元和惠半农、松崖父子校本《周礼注疏》，半农用红笔，松崖用墨笔。松崖先据何义门校宋刻元修本，又据卢雅雨藏宋余仁仲万卷堂本详校。余本旋入内府，今故官藏书中无之，知已散佚，赖此校本，得存余本面目。又眉识语皆精确，多不载于《礼说》、《九经古义》，尤足重也。^①

据吴昕跋，惠校除录八行注疏本、余仁仲本异文外，还杂有所谓徐家本、订义本、互注本、建本，及“宋作某”、“文弼案”等校语；据王大隆跋，惠校本眉端有识语，为惠氏《礼说》、《九经古义》所不载。

今考《校勘记》，有提及“互注本”者，如上文引述的卷三经注文校记：“惠校本亦作‘囿育’，云互注本、余本作‘圃毓’”；“惠校本亦有‘于’字，云互注本、余本无”；“惠校本‘名’一作‘民’，云互注本、余本作‘名’”，皆明确出自惠校本。卷三又有一条引“惠栋云”：“‘胥有才知之称’。释文‘才知音智’。惠栋云：互注本作‘智’。余本作‘知’。”（页138）亦当出自惠校本。所谓“互注本”，即宋刻经书中一类附有重言、重意、互注内容的经注本，今国图藏《纂图互注周礼》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《京本点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礼》即此类，惠校之“互注本”当亦此类版本之一种。

吴昕跋所谓“订义本”，所指当为宋王与之《周礼订义》。《校勘记》卷二采用《周礼订义》一条：“‘疔疡者’。唐石经作‘有疔疡者’。……惠栋云：宋王与之《周礼订义》有‘有’字，宋本注疏无。”此条“惠栋云”引《周礼订义》与唐石经互证，当亦出自惠校本。

《校勘记》有引用惠氏《九经古义》、《礼说》者，亦有多处引用“惠士奇云”、“惠栋云”而不出于《九经古义》、《礼说》者。如卷一：“‘故林孝存以为’。惠栋云：《汉书》及郑志皆作‘临’。”“‘若今凉州乌翅矣’。诸本及《汉制考》同。惠士奇云：‘乌’当作‘鸟’。卢文弼案：《士冠礼》加爵弁如初仪，疏引此注作‘鸟翅’，误本耳。”卷三：“‘二乡则公一人者’。惠栋云：此下有脱文。”王大隆跋云惠校本“眉识语皆精确，多不载于《礼说》、《九经古义》”，正与此相合，可知此类“惠士奇云”、“惠栋云”校语当亦出自惠校本。

由上可知，《校勘记》所使用的惠校本，与上图藏过录惠校本相同，也包含了八行本、余仁仲本之外的其他版本的异文，及惠氏父子据他书所出校语及识语。则《校勘记》“惠校本”少量与八行本不符的异文，除辗转传录中的错误及校勘偶误外，有的可能即出自惠校其他版本，或惠氏他校、理校。上述第11条校记“腊人之类”，惠校本“腊人”上有“鳖人”。八行本、单疏本等各本“腊人”上皆无“鳖人”二字，与惠校不符，惟见宋王与之《周礼订义》卷七引贾疏有“贾氏曰：鳖人腊人之类，有徒无胥，得徒则足，不假长帅”之语。惠校“鳖

^①吴昕、王大隆二跋转录自陈先行、郭立暄整理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选辑（经部）》，《历史文献》第一辑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9年。

人”二字或即由《周礼订义》出。

四、关于“宋本”

《校勘记》引用惠校本时,除“惠校本”之称外,有时称“惠校宋本”,或“宋本周礼疏”,或“宋本疏”、“宋本注疏”,指代较为明确。但《校勘记》也有大量径称“宋本”者,其“宋本”所指,有时为惠校宋本,而大多与惠校宋本无关。其间颇有歧义,须加考辨。

《校勘记》卷一至四“天官”、“地官”经注文校记中,可见大量引用“宋本”之处,多与余本、嘉靖本等文字相同,也有“宋本”独有的异文,如《校勘记》卷四“‘善言近’。宋本‘近’下有‘之’,当衍。”(第154页)“‘恤其乏困也’。宋本作‘困乏’。”(第155页)“‘不聘之者’。宋本、嘉靖本‘聘’作‘娉’。”(第157页)“‘士司寇之属’。宋本下有‘也’。”(第157页)等等。经核对,这些异文与宋刻八行本完全不同。又卷一至四经注校记中可见“宋本载音义”云云,如卷三“‘稟人’。宋本、闽本同。叶抄《释文》及宋本载音义作‘槁人’。”卷四“‘故书附为拊’。宋本、余本、嘉靖本、毛本同。闽、监本‘拊’作‘拊’。宋本载音义亦作‘拊’。”(第159页)《周礼释文校勘记》亦多引“宋本”音义云云。按宋刻八行本为经、注、疏合刻,不附音义,这里的“宋本”显然不可能是八行本。

《校勘记》“引据各本目录”所列宋本,除阮校底本、清人以为宋代刻本的十行本外,“惠校本周礼注疏四十二卷”中包含的余仁仲本异文,《校勘记》径称“余本”,不称“宋本”;宋注疏本异文,《校勘记》称“惠校本”。此外惟“钱孙保所藏宋本周礼注十二卷”,此本今不存,从引据书目小注可知,此本春官、夏官、冬官为“余仁仲本”,天官、地官为“别一宋本”,秋官则是“以俗本抄补”,而“臧庸据宋刻大字本秋官校补”。在《校勘记》各卷校记中,“余仁仲本”径称“余本”;秋官之“以俗本抄补”本,称作“钱抄宋本”、“钱抄本”;秋官之“臧庸据宋刻大字本秋官校补”本,称作“宋刻大字本”、“大字本”,称谓都很明确。惟天官、地官之“别一宋本”,在《校勘记》中易与惠校宋本混淆。钱孙保本今不存,我们无法根据文字异同来比勘此“别一宋本”为何本,但它与余仁仲本类似,为宋刊小字本,附载音义,仅存天官和地官两部分,与《校勘记》卷一至四(内容为天官、地官)经注文校记所列“宋本”、“宋本载音义”是相合的。

《校勘记》卷一至四疏文校记中,可偶见称举“宋本”者。如《校勘记》卷三“‘南北二亿三万二千五百里’。宋本作‘一千’。闽、监、毛本作‘三千’,误。”(第142页)“‘进受命于周退见文武之户者’。宋本无‘命’,‘户’为‘尸’之误。”(第143页)这两条校记出自疏文,而钱孙保本为十二卷经注附音义本,并无疏文,这里的“宋本”不可能是钱孙保本。我们检八行本这两处异文,前者正作“一千”,后者作“进受于周退见文武之尸者”,与《校勘记》所谓“宋本”相合。《校勘记》卷五以下,疏文校记中举“宋本”者更多见。如卷六:

“‘明不据偏歌诗也’。宋本‘歌’下有‘毛’。”（第186页）“‘大宫所生大吕为角’。宋本作‘人宫’。”（第187页）“‘箫有声者不入用’。宋本‘者’作‘音’。”（第187页）“‘鱼尾鸡喙’。宋本作‘啄’。”（第187页）“‘其中诏来瞽歌彻等皆如之’。宋本‘瞽’作‘鼓’。”（第188页）“‘注云小祭祀’。宋本无‘云’。”（第189页）“‘即帝王系也’。宋本作‘王帝’。”（第190页）经核对，这些疏文校记中的“宋本”异文皆与八行本相合。此类疏文校记中称举“宋本”与称举“惠校本”相间杂出，毫无规律，如“‘鱼尾鸡喙’。宋本作‘啄’”前一条“‘羽舞为析羽相对解之’。惠校本无‘相’，此衍”，两条校记相接，一出“惠校本”，一出“宋本”，令人以为是两本，实际上皆与八行本文字相合。根据抽样比勘，我们基本可以确定，疏文校记中所举“宋本”异文，与“惠校本”一致，当主要出自八行本。

《校勘记》卷五以下的经注文校记中，也偶有举“宋本”者。如卷五：“‘札读为截谓疫厉’。余本、闽、监本同。毛本‘厉’改‘疠’。宋本、嘉靖本重‘截’字，与贾疏本同。”（第172页）检八行本此处同宋本、嘉靖本，重“截”字。“‘郊有群臣之兆’。余本、岳本、闽、监、毛本同误也。宋本、嘉靖本‘臣’作‘神’。”（第175页）检八行本此处同宋本、嘉靖本作“神”。“‘晋读为搢绅之搢谓插于绅带之间’。余本、闽、监、毛本同。宋本、嘉靖本‘插’下有‘之’。”（第180页）检八行本此处亦同宋本、嘉靖本，作“插之于绅带之间”。此数条“宋本”校记属“春官”，钱孙保本“春官”部分为余仁仲本，故该“宋本”并非钱孙保本，而其文字又与八行本相合，所指当亦惠校八行本。

同样是八行本异文，为何《校勘记》一云“惠校本”，一云“宋本”，造成读者的混淆呢？我们推测，其中容有校记写作中的不规范之处，但有的也可能是校记作者的无奈之举。上文引上图藏过录惠校本吴昕跋中曾提到，惠校“疏中时杂出‘宋作某’三字”。又小字注云：“万卷本无疏，校疏者，内府宋本也。今杂出‘宋作某’字样，则其余不注者，反似又有别本。”可知惠校本原本校记中即杂出“宋作某”字样。《校勘记》作者无法确定这些“宋作某”与内府宋本的关系，于是干脆沿袭校本中的称谓，杂出所谓“宋本”异文。此类“宋本”，与钱孙保藏宋本、臧庸校宋刻大字本是完全不同的版本，须注意加以区别。

通过以上分析可知，《校勘记》所利用的惠校本，原本包括宋刻八行本及余仁仲本异文，也包括少量其他版本来源或他校、理校之异文。而具体在《校勘记》校记中，“惠校本”又与“余本”分立，夹杂“惠校宋本”、“宋本”之称，主要体现的是宋刻八行本的异文。余仁仲本《周礼》今已亡佚，《校勘记》对惠校余仁仲本异文的采用，为我们保存了余仁仲本的珍贵资料。宋刻八行本文字优胜，《校勘记》据惠校八行本纠正各本讹误甚多，但由于《校勘记》作者未能亲见八行本，漏校、误校之处亦复不少，幸八行本今有传本存世，可补《校勘记》之未备。

【作者简介】张丽娟，女，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。研究方向：版本学、经学文献学。